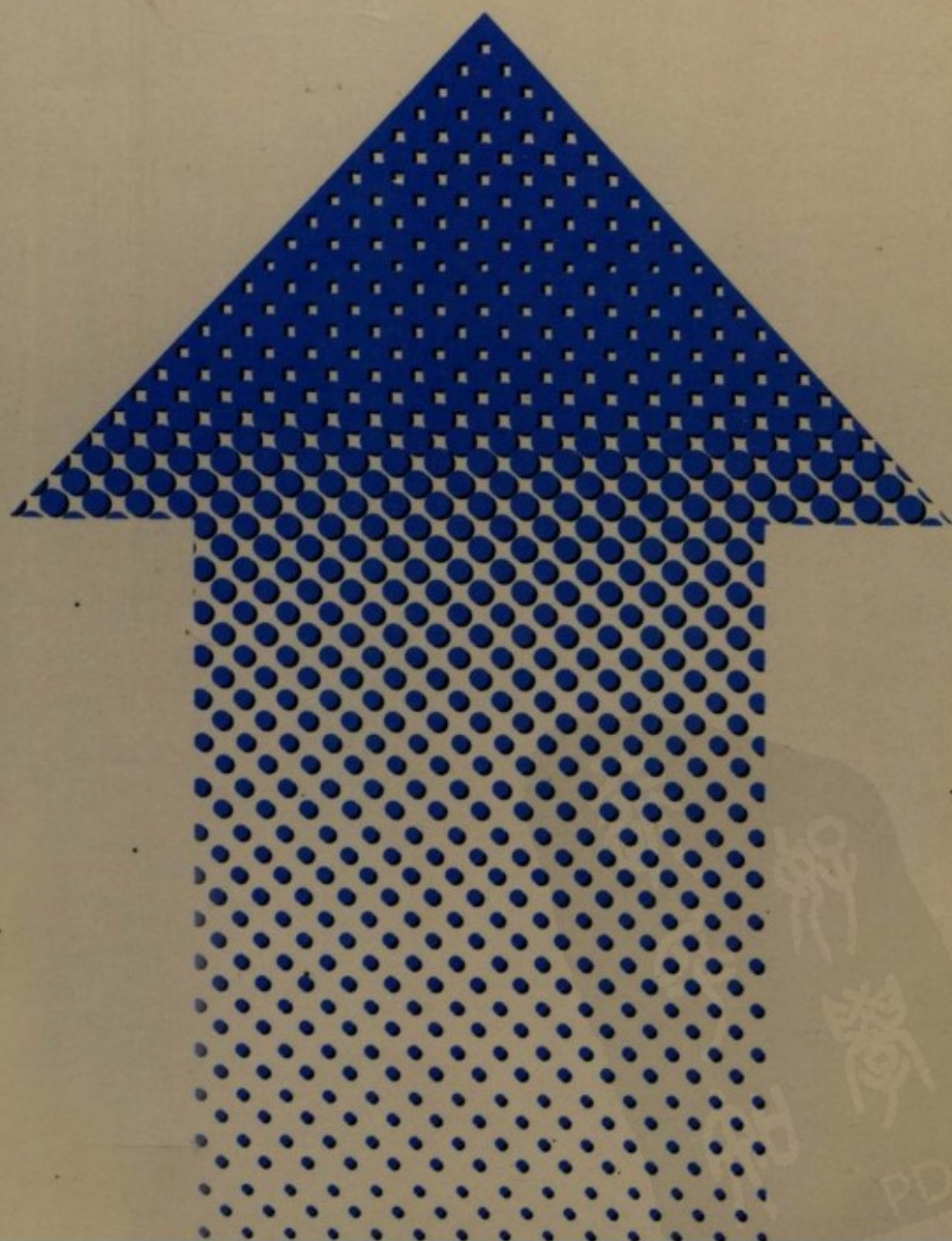


西方致富之路

(美)內森·羅森堡 L.E.小伯澤爾著

劉賽力等譯 周興寶校



界熱門的研究課題。對其過程、原因、後果和最新變化，不同學派各有自成體系的研究進路，有的着眼於經濟結構的轉變，有的從原始積累的角度來檢視這個現象，還有一些則着力探討大規模生產和現代企業的出現……。本書作者獨闢蹊徑，從論述中央集權政治和宗教控制的崩潰開始，研究經濟發展的非經濟性因素和制度性原因。作者認為，經濟領域的相對自主性、政府角色的轉變和企業組織制度的出現，都對經濟發展起着重大的作用；革新和創造則是經濟發展的要素。從上述理論出發，作者指出，小型企業在經濟發展中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從而駁斥了大型企業在發達經濟中佔主導地位的一貫說法。

西方致富之路

(美)內森·羅森堡 L.E.小伯澤爾著

劉賽力 甄炳禧 盧娟 魏強 譯

王鐵利 李衛國 宋煥軍 崔宏

周興寶校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蘇子如
船
PDG

責任編輯 竹 心

裝幀設計 余美明

© Basic Books, Inc. Chinese Edition translated &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Inc.,
New York, U.S.A.

All Rights of Chinese Edition reserved except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 1989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書 名 西方致富之路

作 者 (美)內森·羅森堡 L.E.小伯澤爾

譯 者 劉寶力 甄炳禧 盧娟 魏強 王鐵利
李衛國 宋煥軍 崔宏

校 者 周興寶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 Kong

印 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利眾街四十號二十四樓

版 次 1989年 5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大32開(140×203mm) 384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04·0724·5

© 1989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kong

本書經美國基本叢書出版社同意，
由本店譯成中文出版。

PDG

前言

到了現在，寫一部資本主義各種制度的發展史已經比較容易了，因為人人都知道這些制度所包括的內容：自由市場、私人財產、貨幣、銀行存款、保險、匯票、創辦經濟事業的自由，等等。可是，要寫一部西方國家致富的歷史就比較難了，因為在西方國家是如何富裕起來的問題上，衆說紛云，莫衷一是。也許我們應該從生物學家的經驗中得到一點啓發。在最近的一個半世紀中，生物學家們已認識到，大自然的演變過程能產生出各種系統，小到蛋白質分子，大到沼澤地的生態。這些系統的複雜性使人類的智力不勝負擔。西方經濟增長系統的演變，與大自然的演變過程一樣，同樣有偶然性、試驗性，並非人爲的事先設計，並各自有其生存標準。不管怎麼說，西方財富的獲得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至少生物學提醒我們，不可期望對此有任何現成的解釋。

在我們開始論述西方經濟增長的歷史並探索這一增長的原因之前，我們要提出一些初步的觀點。第一點是非經濟的因素，在西方擺脫貧困的過程中起了作用，其中包括 19 世紀各國政府所起的作用。第二點是組織管理對經濟活動有重要影響。然而，認為組織管理的唯一辦法就是等級統治制度的看法是不妥當的。第三點是運用“資本主義”這一術語，或任何其他以“主義”結尾的有意識形態色彩的術語，來描述在現代西方所採用的帶有試驗性而又往往是實用主

義的經濟觀點是適當的。這一角度往往導致與教科書中關於資本主義的論述相去甚遠的政策與實踐。

經濟增長的非經濟根源和後果

在一篇關於經濟史的論文中承認西方從貧困走向富裕的經濟發展有着非常強大的非經濟的根源和後果是恰當的。西方致富的最為重要的後果，如果以西方賦予人的生命價值來衡量，就是在人口方面造成的影響——人死亡率下降，再加上平均壽命的延長，使人口有了增長。另一個重要後果是西方社會的城市化，即從中世紀以鄉村為主的社會變為現代西方的城市社會。在一個人們不是只吃麵包就能生活的世界裏，如果社會的非經濟部門不能非常出色地適應急劇的變化，要完成現在業已完成的如此巨大的重建工作是不可能的。

承認在西歐的致富中政治制度曾起了作用也是適當的。19世紀和20世紀初西方經濟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特點是存在着一個不受政治及宗教行為約束而具有很大自主性的製造業和貿易界。這至少是與14世紀所受的那種制約很不相同的。然而，自由競爭的做法對西方經濟來說也僅僅是偶而才有的特點。無論是19世紀還是更早的西方各國政府，都曾積極努力促進製造業和貿易的發展。各國政府都設立法庭來保證貿易協定的實施，並使貸款不得倒帳以保護信貸，它們又為對投資和貿易來說是至關重要的財產權利下明確的定義，並有力地保護財產權；它們提供適應企業組織管理的法律模式；它們對鐵路、運河和公路提供補貼；不管是對還是錯，它們都用關稅和配額來保護本國企業免受進口商品的競爭；它們提供一種貨幣，而且在許多國家使之成為一種穩定的價值尺度。在政府的貢獻中，有一些是意義非常重大的，像免費義務教育和交通運輸系統等。政府對海洋運輸的支援，如幫助領航、維修碼頭和防浪堤、疏浚航道港口、進行安全檢查、設置救護站、培訓海員、設立海上醫

院等，已經持續了許多世紀，並不有違任何人的原則。政府准予壟斷以鼓勵建立新興產業的做法，則更為古老。到 18 世紀末，對新的發明授予專利權已成為普遍的做法，並在美國憲法中作了具體規定。

儘管在政治與經濟領域之間的關係中，經濟領域表現出很大的自主性，但在更為一般的意義上，這種關係還包含着許多其他因素。政治領域最根本的特點是社會對暴力的使用具有壟斷性，這意味着為以非暴力方式解決經濟領域的爭端設立一整套法院體系。這還意味着對財產權利下定義並實行保護，其中包括對政治性的掠奪財產和對賦稅徵收的限制。為貿易提供一種用於交換的貨幣中介是一向在西方被行使着的一種古老的政治特權。關於經濟增長是一種變化形式的觀念提醒我們，變化從來也不會只局限在經濟領域之中，它也延伸到社會與政治領域。

然而，儘管在西方經濟增長的主要時期促進製造業和貿易對政治當局來說是必要的，但在 19 世紀，調節和控制貿易、對貿易徵高額的稅、管制價格和工資或力圖消除個人收入之間的巨大差別，都是不合時宜的。行之有效的假定是工業和商業對整體福利有利，因此支持和鼓勵工業和商業是政府的任務。

強調經濟領域不受政治勢力的影響，對一篇經濟史論文來說是恰當的，但這只是事情的一半。政治領域對於經濟領域的干預相對地少使政治領導人得以把力量集中在政府的其它方面，導致 19 世紀和 20 世紀初政治上的進步。

這種政治上的進步和經濟上的進步一樣是史無前例的。民族國家鞏固起來了；有選舉權的人的範圍擴大了；共和的和民主的政府取代了專制的君主政體；律師們致力於司法改革並在許多地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刑事系統經過了徹底的改造；免費的公立學校開辦了起來；國際關係有了很大的改善，從而使歐洲從 1815 年到 1914 年都避免了大的戰爭；由於自願地遵守法律已成了更為普遍的現

象，對犯罪行為的懲處也已更為有效，因此，生命和財產變得更為安全。這些進步是由於稅收的支持才得以實現的。可是現在再回過頭來看，那時的稅收似乎是非常低的。效率高的政府本身就是很有價值的，它無疑會有助於生命安全的保障和物質福利的進步。

組織管理

大多數政治論著都把經濟的組織管理問題當做對什麼樣的活動應該進行組織管理、對什麼樣的活動應該放任自流的問題來對待，又或者當做可由個人抉擇的事情來對待。這種觀點認為，組織管理的唯一形式就是在軍事、政治和一些宗教團體中使用的，建立在領導者及其下屬之間的等級聯繫基礎上的那種直接類型的組織管理。經濟學使用的則是另一種不同的組織管理概念。這一概念是廣義的，足以把一切經濟活動都包括在內。而且這一概念提出的問題，不是對任何特定的活動是否應該進行組織管理，而是應該如何對之進行組織管理。對那些不明白為何除了等級統治制度以外還要想出其他組織管理方式的人來說，對這一差別作初步的解釋也許是有好處的。

在經濟學中，所有經濟活動都是有組織的已經成為正統觀點。因此，在市場上買和賣的人們是在集體地選擇目標，是在為數衆多的人中間為實現這些目標而進行分工，並給出了力的人予以報償。即便是一個顯然是十分簡單的經濟任務，如為消費者的早餐供應雞蛋，也牽涉到一個由數以千計分散在不同國家裏的個人組成的網絡。雖然並無共同的等級統治制度把這數千計的人聯繫在一起，但是每個人却都按部就班地做着自己的那一部分工作，並與其他人配合。如果市場不是一種強大的起組織作用的力量，這一任務就不會像在資本主義經濟中那樣完成得那樣有效。市場有能力引導千萬人確立共同的目標，在許多專業戶之間為實現共同目標而進行分工，並為完成任務提供所需要的報償和刺激。

我們要從兩方面來考慮究竟把市場還是把等級統治制度當作組織管理的模式。公司一般被看作是經濟組織的基本單位。我們發現有些公司是按等級統治制度組織起來的，其他的公司却不是。第二個方面牽涉經濟的全局：在高於公司的層次上，對經濟進行組織的可以是市場關係，也可以是等級統治關係，可以單單是市場關係或單單是等級統治關係，也可以是兩者的結合。由於公司的規模和形式是多種多樣的，等級模式和市場模式實現不同的結合的可能性，實際上是無限的。

那些強調由市場來對經濟進行組織管理會得到最高效益的人認為，少做些組織管理工作比多做更好。他們說，在有些情況下，由市場關係組織為數衆多的人們進行合作，將比按照指令組織起來的合作效益更高，因為在由市場關係組織的合作中，產量與參與合作者的願望是一致的，而且在生產中使用一定數量的經濟資源所能獲得的產量也最大。另外，為證明市場進行組織管理的優越性而常常提出的一條理由是，市場實施的賞罰比等級統治制度中實施的賞罰更大也更明確。因此在市場組織管理下，人們感到了必須竭盡全力的壓力更大。由此看來，兩者之間的差別，並不是多做一些或少做一些組織管理工作的問題。一些測試表明，市場模式是組織管理工作更有效和更有力的形式。

等級統治制度形式和市場形式並非是引導人們合作以實現共同目標的僅有方法。莊園制度是組織經濟的第三種模式。在封建制度的政治和軍事環境下，這一模式曾被用來對農村生活的經濟方面進行組織管理。與當今西方國家的經濟組織管理一樣，莊園制度既有等級統治制度因素，又有非等級統治制度的因素。在本書的第八章中，當我們從社會生活的經濟領域轉向科學領域時，我們發現一個極高效率的組織管理模式。在這一模式中，科學家相互之間的關係，既不能說是等級關係，也不能說是市場關係。

如果人類社會的成員都是《魯濱遜漂流記》中的魯濱遜，每個人

都與世隔絕，並只為滿足他或她自己的需要而生產，那麼可以有把握地說，經濟上生產活動的成果與社會的實際規模相比，將是微不足道的。由於幾乎所有的生產都有賴於合作，能更好地解釋生產水平和經濟增長速度的差別的，是不同的社會中實現合作的方法不同。為了弄清這些差異，我們首先需要懂得，經濟的組織管理形式不是僅有一種。這正是上面的初步論述要指的。

西方經濟體制是資本主義的體制嗎？

認為西方經濟的根本特點是對允許在技術和組織管理方面進行試驗及組織管理形式的多樣性，這種看法，提出了應該怎樣稱謂這種經濟的問題。20 世紀的做法是把西方國家的經濟制度稱為資本主義。這一術語是約定俗成的。但是佔主導地位的事實是，隨着封建主義的衰落，在歐洲興起的經濟制度的主要特點是徹頭徹尾的實用主義：在意識形態上不信奉任何其他的經濟原則，而只遵循一條經濟原則，那就是經濟效益和活力。這種帶來了西方經濟增長的制度，在它被看成為一種制度或被稱為一種意識形態以前就已經發展起來了。很多人在意識形態上都信奉這些經濟思想和制度，例如私人財產的制度、不得無端沒收財產和課稅的制度等等。但是這種信念並不是以這些制度在經濟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為基礎的。亞當·斯密是在 1776 年首次提出為自由競爭的意識形態奠定了基礎的系統理論，而在那個時候西方經濟的一系列基本體制度已經存在，經濟增長也已具相當規模。說真的，如果在其經濟增長的頭一、二百年西方就可被譽為已經擁有了一種經濟方面的意識形態的話，那麼這種意識形態就是重商主義。這一重商主義是亞當·斯密曾激烈而又有力地反駁過的。不管是《共產黨宣言》還是《資本論》第一卷，都沒有用過資本主義這一術語，儘管馬克思在 1877 年與別人的通信中的確曾用過這個詞。據《牛津英語辭典》，第一次使用這個詞的人是

薩克雷，時間是 1854 年。他所使用的這個詞的意義顯然是指擁有資本這種狀況。這個詞第一次被用來指一種經濟制度是在杜埃 1884 年寫的一本題為《更美好的時光》的書中。馬克思的追隨者在 19 世紀末的馬克思主義文獻中發展了資本主義這一術語的用法，使它成了他們要推翻的那個經濟制度的一個蔑稱。按照創造這個術語的人們的設想，這個概念不是爲了用來做理性辯護的，然而維護西方經濟的人却發現使用這個詞非常方便。這種方便使得人們放棄了決不應該使用對手的術語這一修辭原則。

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這一術語可能更適當，因爲西方經濟向來就是一種混合的經濟。但是混合經濟這一術語的用法却假定早先曾有過一個更爲純粹的資本主義時代。所以，儘管頗爲勉強，我們將遵守傳統，並跟別人一樣使用資本主義這個術語：不把它當作是以主義爲正式結尾的意識形態用語，而是把它當作一個方便的名稱，用來指在西方幾百年經濟增長中，在西歐國家發展起來的一整套經濟制度。



致 謝

斯坦利·恩格爾曼閱讀了本書的全部手稿，並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意見和建議，我們對他深表謝意。托馬斯·穆爾和羅伯特·赫森曾對本書的初稿提出過意見、批評和建議，使我們獲益非淺，我們也在此向他們深表謝意。無需說明的是，他們對我們在書中沒有改正的錯誤是不應負任何責任的。我們還要向傑弗里·奧克斯利表示感謝，本書幾乎在每一個方面都得益於他的研究工作。



目 錄

1	前 言
9	致 謝
1	I 緒 論
37	II 起點: 中世紀
75	III 1750 年以前貿易的發展
121	IV 有利於商業發展的制度演進
155	V 1750—1880 年工業的發展
207	VI 組織的多樣性: 公司
231	VII 技術、托拉斯和商品股票
263	VIII 科學與財富間的聯繫
291	IX 企業的多樣化
329	X 暗示與比較

貧困的標準

如果我們回顧人類歷史的長河，並以現代標準去評價我們祖先的經濟生活，那幾乎是一個無窮無盡的苦難故事。典型的人類社會只讓少數人過像樣的生活，而絕大多數人却在極端的貧困中掙扎。文學、詩歌、傳奇故事和神話傳說謳歌生活富裕的人，而漠視那些默默地生活在貧困之中的人；我們之所以忘却其他時代深重的苦難，部分原因即在於這些文學作品的魅力。苦難的時代被神話化了，甚至被看作是田園式純樸生活的黃金時代，其實並非如此。

僅僅在過去的兩百年中，西歐、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及其他一些地方才進入一個歷史上少有的時期，即社會的進步和繁榮與略多於 10% 的最上層人口以外的人的生活發生關係的時期。爲了簡便起見，我們把這些地方統稱爲西方，儘管在地理上並不確切。非常清楚，到 19 世紀初，在英國、美國和西歐的部分地區，人口中已有非常大的一部分比古代中東、印度、中國、希臘、羅馬、伊斯蘭文明時期，也就是比人類歷史上的任何時期，吃得更好，身體更健康，生活也更安定（這種情況隨後也出現在西方其他國家）。

從社會意義上看，從貧困走向富裕是物質福利方面的一個進步。

關於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或實際工資的統計數字並不能充分體現這一進步。死亡從來就是最大的威脅，而由貧困走向富裕，首先就是遠離死亡。其主要的指標就是關於壽命、死亡率和嬰兒死亡率的統計。其次的威脅是飢荒和飢餓。營養不良及與之有關的疾病發生率不斷下降，這又是從貧困走向富裕的一面。有關的統計表明，瘟疫同古代的不幸有密切的關係，它可被視為一切致命或致殘的疾病象徵。擺脫瘟疫也是從貧困走向富裕的一個變化。貧困通常是與文盲、迷信、無知和孤陋寡聞的生活聯繫在一起的。脫貧致富也就是向識字、教育和見多識廣發展。在貧困的生活中，活下去是首要的甚至幾乎是唯一的任務。在那種生活中，住房極為擁擠，無個人安寧可言，一切選擇都限制在極狹窄的範圍之內。走向富裕也就是走向享有個人安寧和選擇的更大可能性。

簡單的統計不能反映以貧困走向富裕的轉變，這有幾個原因。即使是一種簡單的經濟，要對它所生產的無數產品和勞務進行最一般的統計，也必須用貨幣單位來表示。無論要衡量的產品或勞務如何千差萬別，貨幣是衡量數量的共同尺度。因此，無論經濟增長是生產越來越多的同類產品和勞務，或是改變整個生活方式以至社會生產和消費的產品和勞務（實際情況正是如此），統計方法也會是一樣的。

即使在經濟發展的最初階段，人們消費什麼、從事何種勞動和生活的總方式也都會有變化。在西方，最初的變化小得可憐——給一般伙食增加幾樣蔬菜和一點肉，由穿木鞋改為穿皮鞋，單從數字總額就足以相當清楚地說明當時發生的事情。但隨着西方經濟繼續發展，人的生活就完全改變了。童年幹活變為童年上學；終身在莊園或農場幹活變成終身在一個城市行業、工廠工作或從事自由職業。住處也從農村的小屋換成了城裏成排的住宅或公寓。任何一般的統計都不能具體反映出農村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化所產生的影響，也不能反映出由 19 世紀的鐵路和 20 世紀的汽車帶來的生活方式的革

命。就個人而言，貧富之別僅僅在於後者擁有較多的錢財，也許是對的，但就整個社會而論，從我們掌握的為數不多的例子來看，貧富社會之別並不僅僅在於哪個社會擁有較高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而在於富裕的社會為其成員創造了完全不同的生活。

統計的另一個更為嚴重的缺陷是：家庭勞動從未被轉化為貨幣，除非它造出了一種可供出售的產品（如農產品）。因此，當婦女從家務勞動轉向有報酬之就業時，20 世紀之統計把她們的工資總額當作國民生產總值增加的部分，而不管有些人可能認為那也許是生活質量的下降。統計數字的另一個問題是：一些經濟商品和勞務按市場交易中的價格換算成美元，但另一些則根據徵稅或調節的結果換算成美元。由於換算方式不同，在衡量這兩種交易所帶來的物質福利時便缺乏一致標準。

值得我們考慮（至少是順帶考慮）的，還有增長和承繼對西方經濟所作出貢獻的比重問題。在正常的情况下西方經濟每年的生產總值大約有 95% 來自在年初就存在着和發揮作用的那部分經濟，而 5% 或不到 5% 則歸因於當年的經濟增長。但在一般比較長的時間裏，原有的經濟和後來增長的經濟部分的比重則幾乎是倒了過來。在美國，經過價格變動的調整後，1985 年人均產值的 85% 以上是 1885 一年以來的經濟增長所構成的。

當然，這些數字還不是表明這個國家公民物質福利變化最完備指標。但是，人們明顯喜歡 1985 年的生活方式，而且也許除了十分富有者以外，人們生活質量的提高就像定量指標所表明的一樣，使人印象深刻。

一個社會從貧困發展到了富裕，却没有使人民對這個社會感到心滿意足，這當然是可能的。事實上，自我滿足的人民能否由貧困發展到富裕，首先就是大可懷疑的。一般說來，身體健壯而心理上不安的人民甚至可能比由於飢餓而麻木的人民更難對付。然而，即使是一個達到了富裕的國家，也必須準備支持一個繁忙的精神保健

事業，並忍受隨着個人選擇的擴大而來的社會不協調現象。人們對這一從貧困到富裕的轉變是如何實現的問題仍然有着廣泛的興趣。社會變革本身就會帶來一連串新問題，以取代那些老問題。人們更喜歡研究富裕帶來的問題而不是貧困造成的問題，是無可指責的。

由貧變富的過程中人們提供了大量奧秘、意外、故事、勝利和悲劇。它本身就值得人們去反覆地談論。此外，如果人們能更好地理解西方經濟發展的原因，將對那些同公共政策，西方許多經濟機構與及西方經濟前途有關之西方人有幫助，特別是那些感到有責任提供機會給後代和同代人去改善生活處境的人。

西方財富增長的漸進性

要解釋西方經濟增長的問題，我們首先必須研究其最令人傷腦筋的方面，即它的漸進性。

在 19 世紀和 20 世紀，先進的西方國家完全擺脫了貧困而達到了相對的富裕。在這一過程中，其經濟產出沒有出現過突變，而只是以略高於人口增長率的比率持續不斷的增長，——英國和荷蘭在更早時候就已開始了這樣的增長。日本在 1868 年以後仿效西方工業化取代了奇迹般的成就。即使是這樣，日本的成就也是通過每年的些微增長而取得的。在所有這些國家，人口與平均產量都已有了成倍的增加，但也都經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在一年或甚至在十年中，扣除人口增長因素後的經濟增長是很不引人注意的。因此人們普遍認為只有富人才感受到經濟增長，窮人是感受不到的。只是在西方複合增長在 20 世紀持續發展時，才有更多人感受到。顯然，西方工人階級生活越來越好，西方中產階級也逐漸繁榮，而且其佔總人口比例也越來越大。但貧困並沒有消失。西方的成就不在於消滅貧困，而是縮小貧困面，貧困人口從佔總人口的 90% 降到 30%、20% 或更低一些。到底降到多低則因國

4 西方致富之路